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项目

中国经济史新论

ZHONGGUO JINGJISHI XIN LUN

(1840 ~ 1949)

杨德才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项目

中国经济史新论

(1840 ~ 1949)

杨德才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序 一

本书是杨德才教授主持的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课题的成果。对作为中国漫长历史重要组成部分的近代 110 年的经济史进行研究，对我们了解过去、认识现实、指导未来，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949 年以后，中国为什么会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为什么会选择计划经济体制？而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中国为什么又要进行改革开放？为什么要实行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为什么要允许并鼓励民营经济发展？……要想对这些问题做出解答，则必须要研究、了解近代中国经济史。

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的今天，都是从今天之前的历史中走来的，今天这一页一旦被翻过去而成为昨天，其也就成为了历史，从这个角度来说，今天的现实与昨天的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任何人也无法割裂的联系。而 1949 年以后直到今天的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以及制度变迁，同样也不例外地与近代中国经济史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道格拉斯·诺思说：“历史是至关重要的。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其现在可能的选择。要理解经济实绩随时间变化而显现出来的差异，就需要了解经济的演变。”（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译本序）而在考察昨天的历史对今天的经济发展、演变所产生的影响时，则尤其要关注制度因素。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影响经济增长的变量固然很多，但在其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则是制度变量。曼库尔·奥尔森说：“国家收入差距的最重要解释在于其经济政策和制度的差异。”（曼库尔·奥尔森：《为什么有的国家穷有的国家富》，载《比较》第 7 期）“大相径庭的经济绩效，绝非是因为不同的国家拥有各异的资本或资源。

一般而言，这一切并非是由于经济状况最佳的国家获得了众多的资本或某些国家的人民被迫大量地去储蓄，更不是源于这些国家人均享有过多的土地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另一方面，经济上成功的国家往往拥有形形色色的制度，即不同的法律和组织安排及经济政策；而那些在经济上不那么成功的国家则没有这些制度。因此，一国制度的质量在根本上决定了其经济成效。”（曼库尔·奥尔森：《通向经济成功的一条暗道》，载《比较》第11期）道格拉斯·诺思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也指出：“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马克思强调在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中产权的重要作用，以及在现有的产权制度与新技术的生产潜力之间产生的不适应性。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贡献。”（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第68页）诺思对马克思评价很高的原因就在于马克思十分重视制度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影响。

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强力植入的外部因素以及在该因素刺激下而萌动、成长起来的内部因素共同作用下，近代中国发生了强烈的制度变迁，其中既有政治制度变迁，又有经济制度变迁，这些制度变迁及其制度安排直接决定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最终走向。

从政治制度的变迁、安排来看，经历了从高度集权的封建帝制、到高度分权的民主共和制度、再到相对集权的有限民主制度的演变，就结果来看，不同的政治制度安排其绩效显然是不一样的。高度集权的封建帝制彻底扼杀了一切人政治参与、关心时事国运的热情，使产生于民间的诱致性制度需求很难转化为正式的制度安排，这个时候社会能否发生制度变迁则完全取决于实权者的理性与行动。随着民间诱致性制度变迁需求者力量的不断成长壮大，实权者被迫主动进行制度变迁，但整个社会却为此支付了高昂的直接成本与机会成本，而错失了许多发展良机。高度分权的民主共和制度，由于反复博弈、反复谈判的交易成本高昂，同样无法取得理想的制度绩效。相对集权的有限民主制度，一方面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便于全盘、长久规划社会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又给予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各派别的政治参与以有限空间，取得了不错的绩效。

从经济制度的变迁、安排来看，可以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既有根本性的制度变迁，又有局部性的制度变迁，就影响程度而言，最重要的经济制度变迁就是实现了从“重农抑商”制度安排到允许并鼓励民间发展工商业的重大制度转变。中国长期实行“重农抑商”制度安排的后果，是商品经济的不发达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难以萌芽与成长。“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

认为，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否直接影响到分工程度，而分工程度高低又直接影响到生产率的提高。在“重农抑商”制度的约束下，中国商品经济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自然经济也就理所当然地在中国社会中占据了绝对主体的地位。进入近代以后，“重农抑商”制度所赖以生存的外部环境逐步地发生着变化，到20世纪初，中国政府终于做出了允许并鼓励民间发展工商业经济的重大制度变迁，从此之后，中国民营经济开始了名正言顺的发展，成为推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从整个近代来看，当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约束较少的时候，则正是民营经济大发展的时期，同时也是社会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时期，是制度变迁激发了人们发展工商业的活力。尽管如此，自然经济的解体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整个近代时期仍然是非常不充分的，即使在新中国建立后，自然经济也依然是中国社会绝对主要的经济形态。这种状况实际上限定了新中国建立后制度变迁与制度安排的方向。

此外，近代中国利权的大量丧失、殖民地半殖民地化程度的日益深化以及民族工商业经济的难以成长壮大，也对新中国建立后相关制度的变迁与安排产生了重大影响。为了避免“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悲剧再次降临在中国大地上，希望中国实现快速发展、赶超发展、跳跃发展，就成为新中国建立后许多人浓得化不开的“情结”。而照搬前苏联模式、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当时就被许多人认为是一种既可以节约交易成本、集中力量办大事又可以在较短时期内实现中国富强的最佳制度选择。计划经济也许确实能够起到节约交易成本、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实际效果，但计划经济则是与市场经济相对立的，因此，实行计划经济，就必然要扼杀商品经济、排斥民营经济，这样做的后果便是经济发展动力和活力的丧失。没有了商品经济和民营经济，实际上也就决定了一个社会可能取得的经济绩效的最大边界。然而，制度变迁者如果对包括近代中国经济史在内的中外经济史都有深刻的研究或了解，将不难发现，中国古代经济停滞的根源就在于商品经济与民营经济的不发展，而近代某些时期经济的大发展则正是商品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发展所推动的，因此，从这个角度讲，一个社会无论在何时，制度变迁与制度安排都要向着有利于商品经济与民营经济发展的方向努力。而要做出这样理性的制度选择与安排，研究与了解经济史就显得尤为重要。

近代中国110年的经济发展历程是十分特殊的，使得1949年后甚至直到今天所发生的制度变迁与安排都因受到这段历史的影响而被深深地打上了历史的烙印，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这就属于制度变迁中典型的路径依赖。1995年道格拉斯·诺思在北京大学演讲时说：“路径依赖仍然起着作用。……社会演化到今天，我们的文化传统，我们的信仰体系，这一切都是根本性的制

约因素，我们必须仍然考虑这些制约因素。这也就是说我们必须非常敏感地注意到这样一点：你过去是怎样走过来的，你的过渡是怎么进行的。我们必须非常了解这一切。这样，才能很清楚未来面对的制约因素，选择我们有哪些机会。”（道格拉斯·诺思：“制度变迁纲要”，《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页）路径依赖因素对制度变迁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沿着既与的路径，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迅速优化；也可能顺着原来的错误路径往下滑，弄得不好，它们还会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之下。一旦进入锁定状态，要脱身而出就会变得十分困难；还有可能是在既与的制度变迁初期取得了良好绩效，而当初期制度变迁的效用逐步递减后，后期的制度变迁却只是对既与制度的修补，从而影响了制度创新和制度供给。从各个国家或地区制度变迁的历程来看，许多国家或地区的制度变迁都受到过路径依赖因素的影响。今天我们进行制度变迁时必须时刻注意近代中国那段历史“路径依赖”因素的影响。因为“制度可以按有利于或不利于增长的方向变化”，（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02页）只有时刻密切关注制度的变迁与绩效，才有可能规避进入“锁定”状态，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

杨德才教授的《中国经济史新论（1840～1949）》对近代中国110年的经济发展、演变历史进行了深入研究，视角很新，使用的理论和方法也比较新颖和先进，与我已接触到的经济史学著作是完全不同的。本书分析的理论支持主要来自新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作者运用经济学里这些比较新的理论来研究、分析近代中国经济史，得出了许多与众不同的结论。他的这种敢于探索、勇于争先的研究精神是十分值得称赞的。

杨德才教授在学生时代曾受过系统的史学教育，有良好的史学功底，现在南京大学商学院经济学系从事经济学教学科研工作，阅读了大量的经济学著作，公开发表或出版了数篇（部）经济学论文与著作，他的这种学术背景，为他在经济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经济史学领域进行尝试与创新提供了坚实基础和有利条件。这本书体系合理，资料翔实，观点新颖，对我们重新认识近代中国经济史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有很强的启发性。因此，我乐意为本著作序，并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同时，也祝愿并希望杨德才教授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为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与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洪银兴

2004年6月于南京大学

序 二

展 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著作——《中国经济史新论（1840～1949）》是杨德才教授主持的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课题的成果。我读了这部著作后深感作者在许多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与创新，的确是一部“新论”。

本书的创新是建立在占有丰富资料、吸收他人成果、深刻研究、反复论证的基础之上的，因而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作者将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运用于近代中国经济史的研究，这不仅开拓了研究的视野，同时也对我们究竟该怎样进行经济史的研究提出了思考：

第一，学科交叉已成为当今学科发展中最令人炫目的一道风景线，发展最快的学科往往就是新兴的交叉学科。

最近 20 年来，经济史学在国外社会科学中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似乎成了一门“显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大批重量级的经济学家加入到了经济史学研究的行列中来，使得经济史学真正成为了一门经济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取得了巨大成果，出现了一批著名的经济史学家，如罗纳德·科斯、道格拉斯·诺思、罗伯特·W·福格尔等，他们都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经济史学因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的介入，获得了极大发展，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中国经济史学研究也应该成为经济学与历史学交叉的一门学科，惟有这样，中国经济史学研究才可能有发展、有创新。

第二，经济史学研究只有注重新理论、新方法的运用，变死历史为活历史，才能真正做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历史是复杂的。一成不变地使用一种理论、一种方法进行研究，将很难推动学科发展和学术深入。新理论、新方法可以开阔视

野、拓展思路。道格拉斯·诺思运用产权理论解释西方世界的兴起、张五常运用交易成本理论发展了佃农理论，我们要想推进中国经济史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则必须大胆地借鉴并运用新理论新方法，只有这样，死的、静止的历史才会活跃起来，司马迁所提出的史学及史学家的使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才会真正得以实现。

第三，勇于假设，小心求证，以理论指导研究，用研究推动理论创新。

不断引进和运用新理论、新方法于经济史研究中，对史料加以重新的组合，往往具有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令人惊异的力量，给历史一个崭新的诠释。当我们运用某种理论来研究历史时，如果发现不能解释的现象，不应用理论框架来剪裁历史，而应考虑这种理论有什么不完善之处，从而加以修正。在遇到这种矛盾时，正是我们在理论上有可能取得重大突破的临界点。“勇于假设，小心求证”。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在研究西方各国（尤其是美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发现已有的经济增长理论对历史上发生的经济增长并不能满意地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所以提出了制度变迁理论。这一理论的创新及其提出，就在于研究者“勇于假设”，不迷信传统理论，通过他们自己的“小心求证”，完善了制度变迁理论，引发了一场“新经济史学革命”，从而推动了经济学理论的更大发展。

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读者可以看到本书在下列三个方面颇具新意：体例布局新、理论方法新、观点新。

德才教授是在南京大学历史系攻读并取得博士学位的。我和他有一段共同学习和研究的经历，深知他勤于读书，善于思考。这本书中引用前辈学者的著作和资料之丰富、理论分析之深刻，都可以印证我的印象。

最近，《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已经公开影印出版，共有170册，这是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极重要、极丰富的资料。我祝贺《中国经济史新论（1840～1949）》的出版，也衷心希望德才教授下决心“坐十年冷板凳”，通读海关档案资料，对这部著作进行补充、修订，这是一项很有学术价值的工作。德才教授学术基础甚好，又值壮年，精力充沛，我相信他在这方面一定会取得巨大的成果！

茅家琦

2004年6月于南京大学

前言

在我国，经济史的研究著作本来就不多，而在这不多的经济史研究著作中，使用经济学理论及其方法来从事中国经济史研究的著作更是凤毛麟角，这样，就使得我国的经济史研究工作一直局限于史料的收集、整理和考证，经济史著作不论是采用编年体法还是采用主题叙述法，都往往是材料的堆砌和罗列。经济史就像历史学的其他分支学科（如政治史、法律史和技术史）一样，它们彼此间的区别只不过是研究领域不同而已，而没有表现出研究方法上的差异。这显然是不正常和不够先进的。

作为经济学重要组成部分的经济史学，在西方一直受到很高的重视，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更首先是一个经济史学家。他们认为，一方面经济史学对于经济学的发展和经济研究工作者是十分重要的；另一方面，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及其理论又可以推进并拓展经济史学研究的深入。因此，他们强调认为，经济研究工作者应有良好的经济史学素养、有“历史感”，惟有这样，才不至于使经济学脱离现实、陷于纯粹的“形而上学”的一种理论演绎或数学推导。按照他们的论述，经济史学之所以十分重要的原因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经济史知识是学好经济学的基础和重中之重。

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说：“经济‘科学’家与一般对经济问题想过、谈过和写过文章的人之间的区别在于‘科学’家掌握了三门基础学问：历史、统计和‘理论’。这三门学问合在一起构成我们所谓的经济分析。”“三门基础学问之中，包括直到今天为止的事实在内的经济史是最重要的一门。照我现在的愿望，假使我要从头开始研究经济，而又只能在三门中选择一门来研究的话，

那么我要选择的是经济史。”他认为理由有三：“首先，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的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其次，历史的叙述不可能是纯经济的，它必然要反映那些不属于纯经济的‘制度方面的’事实。因此历史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让我们了解经济与非经济的事实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以及各种社会科学应该怎样联系在一起。再次，我相信目前经济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是由于缺乏历史的经验，而经济学家在其他方面的欠缺到是次要的。当然，历史应该包括科学分工和专业化以来那些采用不同名称的学科，如包括史前记载与人种学（人类学）在内。”^①

第二，经济史对经济理论的形成有显著贡献，为经济学家的研究免费提供“自然实验”。

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W·福格尔在1993年获诺贝尔奖而发表的演讲《经济增长，人口理论和生理学：长期过程对制订经济政策的意义》一文中说：“经济史对经济理论的形成有显著贡献。经济学家中发现历史是他们的思想一个重要来源的如斯密、马尔萨斯、马克思、马歇尔、凯恩斯、希克斯、阿罗、弗里德曼、索罗和贝克。西蒙·库兹涅茨着重指出，不考虑历史常使研究人员误解当前的经济问题，他们没有觉察到他们的推论建筑在暂时的情况上。”^②N·格雷格瑞·曼昆更认为，经济史为经济学家研究现实经济问题免费提供了“自然实验”。他说：“虽然经济学家像其他科学家一样运用理论与观察，但他们面临使他们的工作更具挑战性的障碍：在经济学中试验通常是困难的。研究万有引力的物理学家可以在他们的实验室里扔下许多物体以得到检验他们理论的数据。与此相比，并不允许研究通货膨胀的经济学家仅仅为了得到有用的数据而控制一国的货币供给。经济学家和天文学家与进化论生物学家一样，通常不得不使用这个世界碰巧向他们提供的数据。为了寻找实验室试验的替代品，经济学家十分关注历史所提供的自然实验。……因为它们（指这些历史自然实验）使我们能了解过去的经济，更重要的则是因为它们使我们可以说明并评价现在的经济理论。”^③

第三，经济史的发展可以超越由已知理论和现代数据分析推导的假说。

西奥多·舒尔茨说：“研究的目的在于加深对经济行为的理解。而完全依靠从标准理论推出的假说是不够的。”因此，他认为经济史的研究与发展可以超越由已知理论和现代数据分析推导的假说；好多经济体都打上了历史的烙印，在进行跨部门经济事件的实证研究时，不能不予考虑。他说：“经济史学家有几方面的优势。他们通常自己准备需要的数据，与此同时，他们很少受隐

藏在可获得的现代数据中的遗漏和错误的影响。尽管大量资金被用于‘受控制实验’，但却没什么成果，因为不可能在实验中控制所有影响人们的变化经济环境，并且实验涉及的人员会以谋略对付控制实验者。但是历史，充满了经济环境的变化，并且人们对这些变化的经济反映被记录在案。它们是真实的可观察事件的源泉，这些事件所发生的环境近似于受控实验需要而又无法设计出来的环境。”他最后说：“经济史的作用不是重写历史。它应该分辨特定的历史经济环境，以达到拓展我们关于经济行为的知识的目的。关于理论，需经常超越现有理论，这意味着对理论进行某些有益的拓展是必要的。这也意味着能够找到一系列历史事件服务于眼前的目的：经济史学家可以从‘天然’经济实验中搜集到各研究课题所需的资料。”^④

从这些著名经济学家的论述中能够看到，经济史学研究不论是对人们了解过去，还是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以及对现实经济问题的分析理解都是十分重要的。有的学者说：“对于沉迷于自然科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范式的经济学家而言，历史经济学也能给予他们很大帮助。数十年来，通过将经济学的每一领域都数学化，并给予受主观性影响最少的专业——数学理论——以特别的荣誉，经济学家一直在努力使自己以‘软’科学家的形象出现。而经济史则提醒经济学家自己的根仍在人类学科中的历史和哲学。这也许让经济学家感到不舒服，但正如罗伯特·海尔布罗纳的评论所言：‘数学给经济学带来了精确，但不幸的是，数学也带来了死亡。’……（但）我们所得到的教训是：历史真的很重要，这不仅表现在路径依赖的过程中，而且表现在历史上类似的事件，我们对变化的认识，以及我们力图对内在过程的理解中。”^⑤“尽管经济学家都渴望成为客观的科学家，但他们仍经常沦为未经检验的理论的囚犯。过去岁月里产生的理论成了我们对今天的假定。在实际中，这样的传统不可避免。然而，好的经济史能使经济学家具有批评精神。我们可以避免‘特征’（它简直就是‘错误’的同义词）事实。”^⑥

经济史学是如此的重要，而现实中的绝大多数经济学研究者又不愿意去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以致从一些经济学家的口中和笔下所表现出来的对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评价就显得十分幼稚可笑。有学者说，不能量化的学科就不可能成为一门科学，觉得这种论断未免有些武断。历史学、政治学、哲学等许多社会学科，确实难以量化，若照此论断，它们似乎都不能成为科学，殊不知，这些学科却是有着与人类一样漫长的发展历史，理论丰富，自成一派，并且正是在这些学科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才衍生出了生物学、物理学、经济学等学科。

不能量化的学科不仅可以成为科学而且还是十分重要的学科，而部分可以

量化、部分无法量化的经济史学同样不仅可以成为科学而且也是十分重要的学科。基于这样的认识，在写作过程中，总是力图将能量化的尽量做到量化分析，不能量化的也要按照规范的分析方法来进行，以将本书写成一本能够受到经济学家与历史学家共同欢迎的书。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试图摆脱传统史学的窠臼，而以西方经济学理论、尤其是发展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为指导，对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及其运行进行系统的分析。本书的主线是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在写作中则具体围绕四个重点来展开：

1. 农村经济、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变化。中国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自然经济根深蒂固，几千年时间里也只发生了很小的量变，离质变的要求还非常遥远。这种自然经济实际上就成为中国农村经济的代名词，自然经济的变化就是农村经济的变化，而农村经济的发展也就是自然经济的发展。然而，作为商品经济其是与自然经济呈现此消彼长关系的。进入近代以后，紧随西方列强坚船利炮而强力植入中国社会的商品经济因素一天天成长、发展起来，自然经济开始一点点化解。在自然经济逐步解体、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中国近代农村经济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租佃制度、土地所有制等都有较大的变化，农民不断地或被动或主动地进入市场，农村的商品经济范围不断地扩大着，全国统一的民族市场不断地扩大并呈现出最终形成的可能性（但最终并未形成），农村经济由起初的有所发展到后来的逐步走向破产，不同的土地制度安排决定了民心的不同指向，而不同的民心指向则最终决定了近代中国的命运走向。而从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角度而言，商品经济的扩展与自然经济的收缩，则是与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起伏呈正相关关系的。当商品经济发展不断扩大的时候，也正是近代中国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时期；而当农村走向破产、自然经济又回归性发展的时候，则又正是近代中国经济发展比较慢的时期。

2. 近代中国工业化的发展变化过程。自英国发生产业革命后，世界各国近代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实现工业化（有的表述为“近代化”），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大门后，近代中国面临的主要任务同样不例外地也是实现工业化。近代中国工业化发展呈现明显的三个阶段：起步时期（1860～1894年）、初步发展时期（1913～1926年）和继续发展时期（1927～1936年）。在这三个阶段，近代中国工业化水平不断地得到提高。近代工业化始终选择的是进口替代战略。只是实施这一战略的主体经历了由弱政府主导到民间主导再到强政府主导的转换变化。在实施主体转换变化的过程中，近代中国工业化取得的成果越来越多，如果不是由于日本蓄意发动了两场阻碍近代中国工业化起飞的战争，近代中国工业化的实现并不一定就是不可能的东西。工业化的不断发展，

使得中国社会特征由起初的一元经济（即传统农业）转变为后来的二元经济（即传统农业与近代工业并存），由于整体上近代中国工商业的发展不是很快，所以，即使到近代末期，人们看到的并不是二元经济的鸿沟逐步消弭和向一元经济（近代工商业）的过渡，而是继续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与近代工业化相伴随的，是近代中国商品经济成分的不断扩大及城市化的起步、发展。国内民族资本及工商业的发展与外国直接投资及工矿企业的兴办，共同推动着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发展。而城市化的发展反过来又为近代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3. 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的过程及其影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说：“过去和现在经济运行不好的根源就在于基本解决规则的设计和和实施失误。”^⑦在近代之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呈现出强烈的“路径依赖”特征，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达到了一种静止的均衡状态。这种均衡状态的现实表现就是中国社会发展非常缓慢甚至陷入停滞“锁定”状态中。进入近代以后，列强的坚船利炮、商品经济的发展、民营经济的成长、国破家亡的危机以及近代民主思潮的兴起，使经济发展的外部制度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有的制度均衡被一点点打破，制度的持续变迁成为近代经济史中一个非常鲜明的特征。而正是这些持续不断的制度变迁成为促进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很明显，制度变迁过程与近代中国 110 年的历史相始终，应该讲，绝大多数制度是朝着促进经济发展的方向变迁的，但也有一些制度的变迁由于受到利益集团及变迁者有限理性的制约而成效甚微，这其中以农村制度变迁最为典型。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非常悠久历史的国度里，一方面进行制度变迁的阻力很大、困难重重，但另一方面成功的制度变迁又成为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最关键性的因素，因此，中国经济要想有所发展，必须持续地进行制度变迁，以保证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制度能够持续地供给。

4. 民营经济的发展变化过程。制度对于经济发展之所以是如此的重要，其根本原因在于不同的制度安排对人们（经济人）的激励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不同的制度安排，人们做出的反应和选择是不一样的。一切制度变迁的落脚点在于：通过制度安排将人们的所有内在动力激发出来，而民营经济是否发展与活跃，便是检验一个社会制度安排是否合理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标准。近代时期，由于持续的制度变迁，人们对此做出了相应的反应，民营经济获得了比较大的发展，这真正是中国几千年之“巨变”。从近代工业化起步开始直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民营经济一直呈现出向上的发展势头。民营经济之不断发展、民营企业家的不断涌现，解决了困扰中国几千年经济发展的动力不足问题，这样，在制度变迁与民营经济发展的合力下，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终于连续

出现了两个“黄金时期”。允许并鼓励民营经济发展，进而调动人们发展经济的积极性，西方许多经济学家对此都有深刻的认识，英国经济学家曼德维尔指出：“人若没有欲望的驱使，便绝不会去拼搏奋斗；当人们躺在休眠状态中时，任何东西都不能使他们奋起，其卓越与才能亦永远不会被发现。人这部怠惰的机器若没有人的激情的影响，将可以被恰当地比做一台没有受到风力影响的巨大风磨。……（因此）若想使一个人类社会强大有力，就必须去唤醒其种种激情。”^⑧而通过制度安排鼓励并允许人们发展民营经济，就必将唤醒经济人与生俱有的内在“激情”，整个社会也将因此而充满勃勃生机。

在近代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殖民地半殖民地程度越来越深化的背景下，近代中国经济在某些时期是有较大发展的，工业化也取得了不错的绩效，而经济发展的快慢与否取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好坏、政府作用的大小和制度变迁的是否及时，这是近代经济发展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力所能及地参考了大量公开出版的文献，对有些重要的研究成果，限于时间的仓促而在本书中直接加以引用，对这些研究者，本人表示由衷的敬意和谢意！近代110年的历史，风云变幻、千头万绪，因此，写作中就不可能事无巨细、面面俱到，而只能带着很强的主观意识去选择取舍，并尽可能地勾勒出近代经济发展、演变的轨迹。

虽然笔者在行文分析中尽可能做到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经济分析与历史分析、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等的有机结合，但由于经济史学的研究所需要的知识储备是那样的丰富，以致笔者尽管使出浑身解数、全力以赴，但所收获的绩效却依然微不足道，而仍需百倍努力。

凯恩斯说：“经济学研究似乎并不需要任何极高的特殊天赋。与更高深的哲学或纯科学相比，经济学不是……一门极其容易的学科吗？一门容易的学科，但这个学科中很少有人能出类拔萃！这个悖论的解释也许在于杰出的经济学家应该具有各种天赋的罕见的结合。在某种程度上他应该是数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和哲学家。他必须了解符号并用文字表达出来。他必须根据一般性来深入思考特殊性，并在思绪奔放的同时触及抽象与具体。他必须根据过去、为着未来而研究现在。他必须考虑到人性或人的制度的每一部分。他必须同时保持果断而客观的情绪；像艺术家一样冷漠而不流俗，但有时又要像政治家一样脚踏实地。”^⑨这是一个很高的标准，但是，要想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经济学家，你就不能不了解、熟悉甚至研究经济史。因此，这部经济史的写作及其出版，希望对那些有志于成为出类拔萃经济学家的经济研究者有所帮助。惟此足矣！

注释：

①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8~29页。

②罗伯特·W·福格尔：《经济增长，人口理论和生理学：长期过程对制订经济政策的意义》，载《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讲演集》，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7~228页。

③曼昆：《经济学原理（第二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

④西奥多·舒尔茨：《由经济史拓展经济学》，载《报酬递增的源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⑤杰里米·阿塔克、彼得·帕塞尔：《新美国经济史（第2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⑥同⑤，第8页。

⑦道格拉斯·诺思：《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载盛洪主编：《现代制度经济学》，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93页。

⑧伯纳德·曼德维尔：《蜜蜂的寓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1页。

⑨同③，第34页。

目 录

序一	洪银兴
序二	茅家琦
前言	1

第 1 章

近代中国的经济增长：总论	1
--------------------	---

封建社会后期的经济衰退	1	封建社会后期经济衰退原因	5	近代经 济发展的特点判断	15	近代经济增长及阶段划分	21	近代经济增长 波动的源泉	24
-------------	---	--------------	---	-----------------	----	-------------	----	-----------------	----

第 2 章

两次鸦片战争：一些原因和后果	31
----------------------	----

中英贸易与鸦片走私	31	两次鸦片战争：真正的原因	36	“条约制 度”的创立与影响	43	贸易结构与内容的巨变	48	外资银行的进入 与扩张	53	外国资本的产业投资	56	列强入侵与中国资本主义成 长	57
-----------	----	--------------	----	------------------	----	------------	----	----------------	----	-----------	----	-------------------	----

第 3 章

鸦片战争后农村经济与商品经济发展	64
------------------------	----

自然经济的顽固与解体	64	纺与织解体的差异及原因	65	冶铁、榨 油等手工业的衰落	69	小农的无奈：被迫走向市场	72	永佃制的盛 行与扩大	74	小土地所有制与资本主义农业经营的发展	76	商品经 济发展与商业革命	78	商品经济发展的变迁与阻碍	82	买办商人与 商品经济发展	84	国内市场的缓慢扩大	88
------------	----	-------------	----	------------------	----	--------------	----	---------------	----	--------------------	----	-----------------	----	--------------	----	-----------------	----	-----------	----

第4章

工业化的开始 95

工业化的障碍 95 进口替代与工业化起步 101 民用工业企业的生产率变化 107 工业化的扩展：民办企业的出现 110 变动中的企业组织形式：股份公司的试行与变异 114 资本稀缺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121

第5章

甲午战争的经济分析 132

日本工业化与战争的爆发 132 中国所付出的战争成本 134 主体转换：民办企业的成长 138 战争诱发的制度变迁 141 官办企业：基础产品供给与产权变革 144 民办工业的初步发展 150

第6章

外国在华投资：规模与效应 155

外国投资作用：意见与争论 155 外国直接投资及其热潮 157 外国间接投资的与日俱增 161 利润率、资本成本与资本吸收能力 164 外国投资增长中的中资企业发展 170 外国直接投资的效应 178

第7章

甲午战争前后的货币与银行业 185

什么是货币？ 185 由银两、制钱制度到银元、铜元制度 187 银贵钱贱、通货膨胀与金融风潮 193 传统金融机构：钱庄与票号的发展变化 198 混乱的纸币及对发行纸币的认识 203 新式金融机构：中国银行业的产生 207 增长和1927年之前的近代银行业 211

第8章

制度变迁：从清末新政到辛亥革命 220

制度变迁的方式比较及选择 220 为什么清末会发生强制性制度变迁 223 清末新政中的经济制度变迁 228 清末宪政的经济分析 232 清末的主动开放：自开商埠的效用 236 辛亥革命后的经济制度变迁 241 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必要性 246